

QINHEFENGYUN

HONGDAOYI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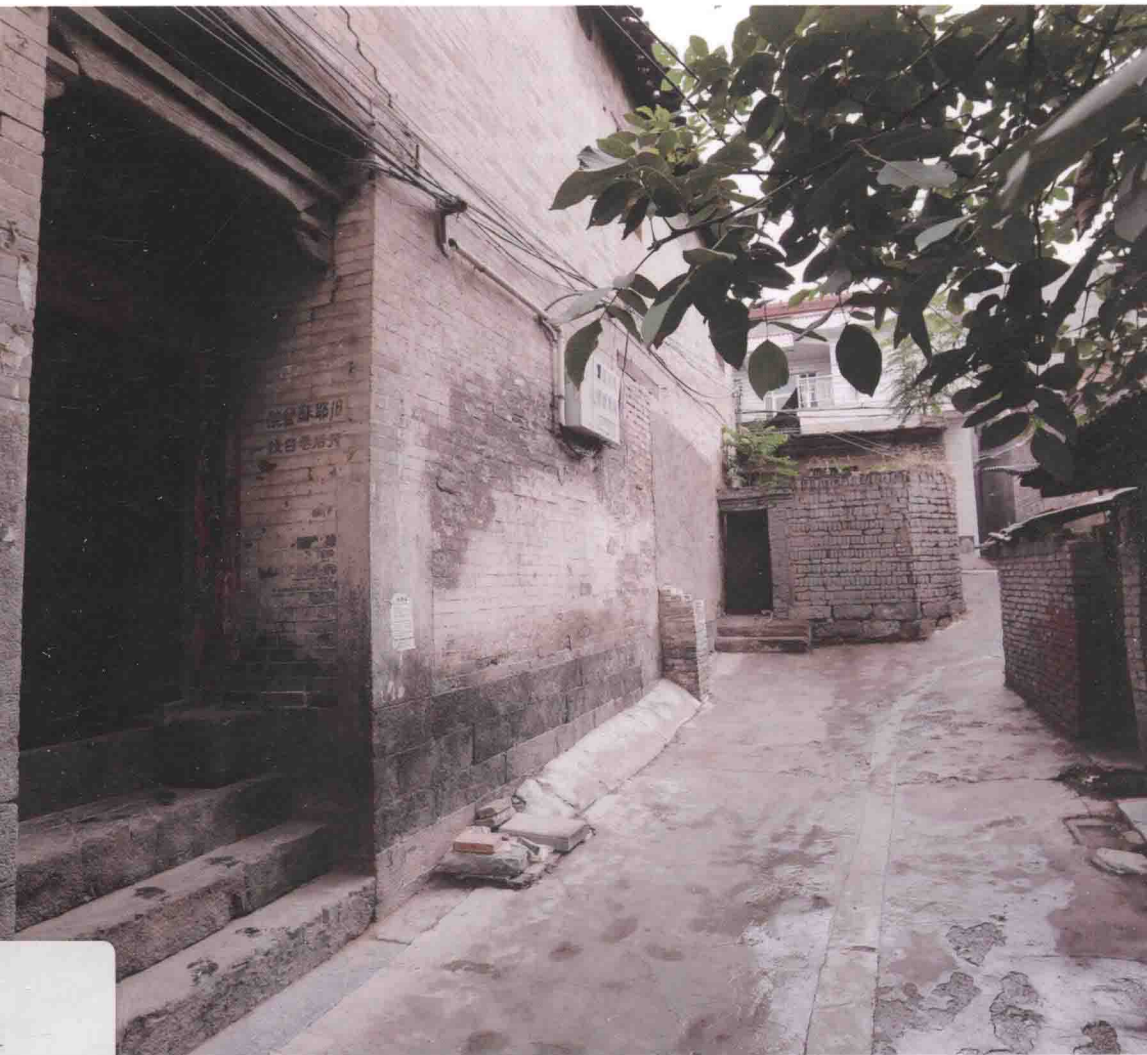
沁河风韵系列丛书

主编 | 行 龙

弘道遗爱

来华英国女传教士艾伟德传

赵中亚 | 著



QINHEFENGYUN

沁河风韵系列丛书

HONGDAOYIAI

主编 | 行 龙

弘道遗爱

来华英国女传教士艾伟德传

赵中亚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弘道遗爱：来华英国女传教士艾伟德传 / 赵中亚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 6

(沁河风韵系列丛书 / 行龙主编)

ISBN 978 - 7 - 203 - 09612 - 2

I. ①弘… II. ①赵… III. ①艾伟德, G. (1902 ~ 1970) - 传记 IV. ①B979. 95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03629 号

弘道遗爱：来华英国女传教士艾伟德传

丛书主编：行 龙

著 者：赵中亚

责任编辑：王新斐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 (传真)

天猫官网：<http://sxrmcbs.tmall.com> 电话：0351—4922159

E - 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 × 1010mm 1/16

印 张：14

字 数：250 千字

印 数：1 - 1600 册

版 次：2016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203 - 09612 - 2

定 价：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风韵是那前代流传至今的风尚和韵致。

沁河是山西的一条母亲河。

沁河流域有其特有的风尚和韵致，

那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至今依然风韵犹存。

这里是中华传统文明的孵化地，

这里是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过渡带，

这里有闻名于世的北方城堡，

这里有相当丰厚的煤铁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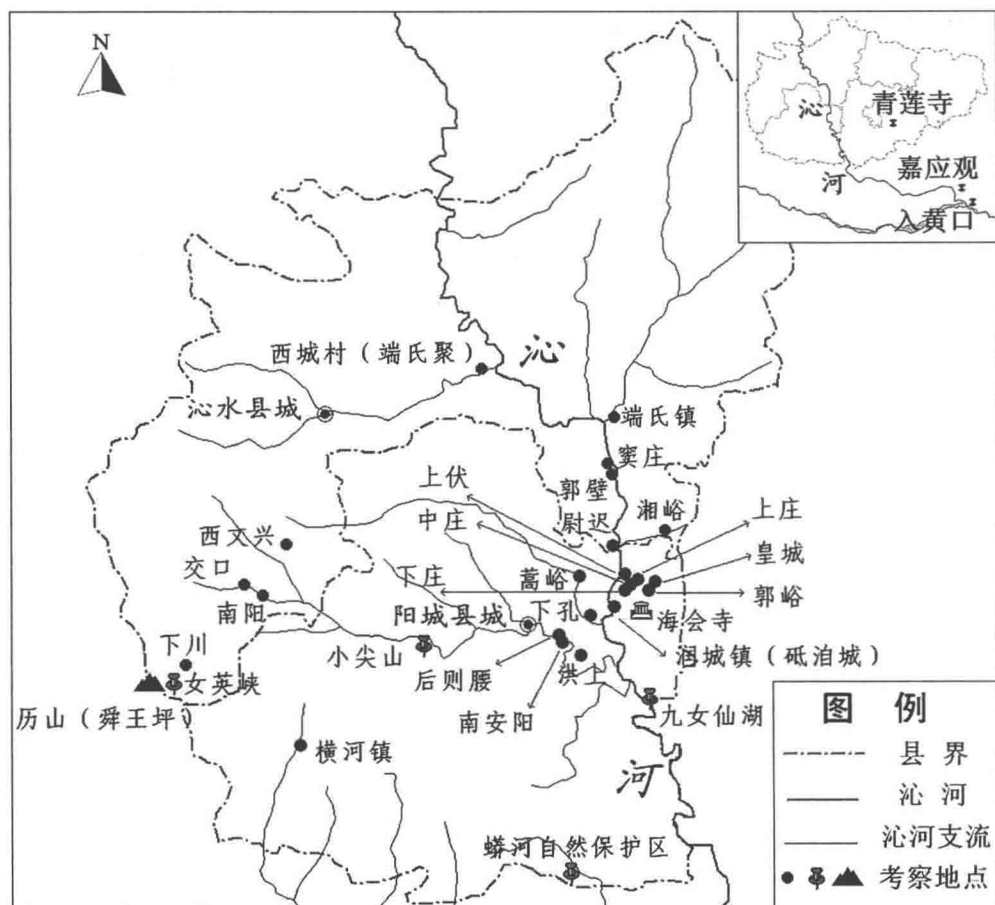
这里有山水环绕的地理环境，

这里更有那独特而深厚的历史文化风貌。

由此，我们组成“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

由此，我们从校园和图书馆走向田野与社会，

走向风光无限、风韵犹存的沁河流域。



“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集体考察地点一览表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李嘎绘制)

三晋文化传承与保护协同创新中心

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

一个多学科融合的平台
一个众教授聚首的场域

第一场

鸣锣开张：

走向沁河流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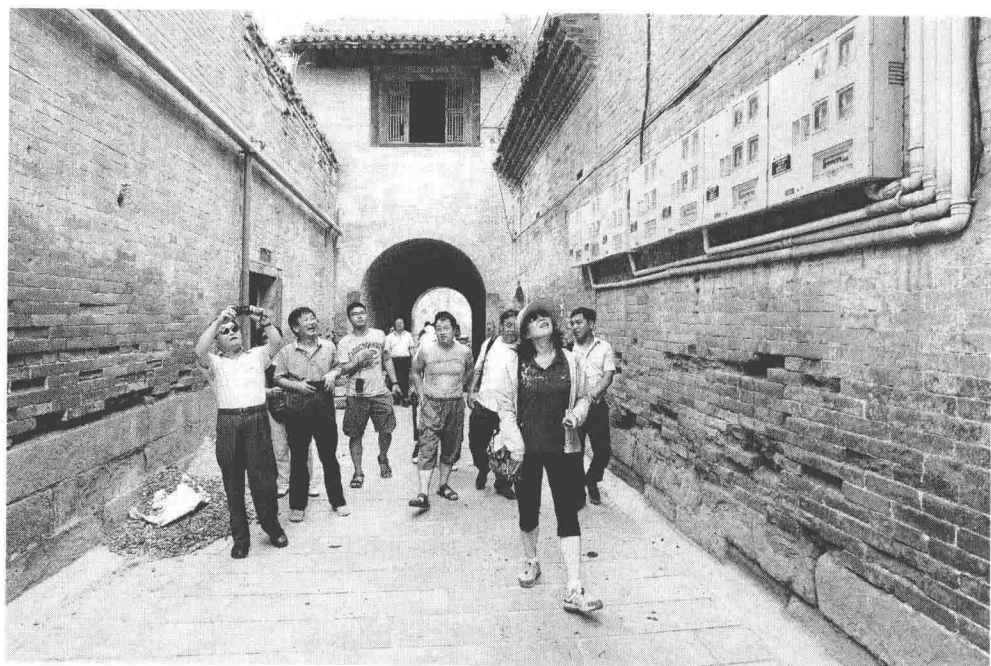
主讲人：行龙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教授

时间：2014年6月20日晚7:30

地点：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晋知楼）

“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海报



田野考察



会议讨论

总 序

行 龙

“沁河风韵”系列丛书就要付梓了。我作为这套丛书的作者之一，同时作为这个团队的一分子，乐意受诸位作者之托写下一点感想，权且充序，既就教于作者诸位，也就教于读者大众。

“沁河风韵”是一套31本的系列丛书，又是一个学术团队的集体成果。31本著作，一律聚焦沁河流域，涉及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生态、旅游、城镇、教育、灾害、民俗、考古、方言、艺术、体育等多方面，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可以说，这是迄今有关沁河流域学术研究最具规模的成果展现，也是一次集中多学科专家学者比肩而事、“协同创新”的具体实践。

说到“协同创新”，是要费一点笔墨的。带有学究式的“协同创新”概念大意是这样：协同创新是创新资源和要素的有效汇聚，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彼此间人才、信息、技术等创新活力而实现深度合作。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大家集中精力干一件事情。教育部2011年《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提出，要探索适应于不同需求的协同创新模式，营造有利于协同创新的环境和氛围。具体做法上又提出“四个面向”：面向科学前沿、面向文化传承、面向行业产业、面向区域发展。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2014年春天，山西大学成立了“八大协同创新中心”，其中一个是由我主持的“三晋文化传承与保护协同创新中心”。在2013年11月山西大学与晋城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基础上，在

征求校内外多位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集中校内外多学科同仁对沁河流域进行集体考察研究的计划，“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由此诞生。

风韵是那前代流传至今的风尚和韵致。词有流风余韵，风韵犹存。

沁河是山西境内仅次于汾河的第二条大河，也是山西的一条母亲河。沁河流域有其特有的风尚和韵致：这里是中华传统文明的孵化器；这里是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过渡带；这里有闻名于世的“北方城堡”；这里有相当丰厚的煤铁资源；这里有山水环绕的地理环境；这里更有那独特而丰厚的历史文化风貌。

横穿山西中部盆地的汾河流域以晋商大院那样的符号已为世人所熟识，太行山间的沁河流域却似乎是“养在深闺人不识”。与时俱进，与日俱新，沁河流域在滚滚前行的社会大潮中也在波涛翻涌。由此，我们注目沁河流域，我们走向沁河流域。

以“学术工作坊”的形式对沁河流域进行考察和研究，是由我自以为是、擅作主张提出来的。2014年6月20日，一个周五的晚上，我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术报告厅作了题为“鸣锣开张：走向沁河流域”的报告。在事先张贴的海报上，我特意提醒在左上角印上两行小字“一个多学科融合的平台，一个众教授聚首的场域”，其实就是工作坊的运行模式。

“工作坊”（workshop）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用中国话来讲就是我们传统上的“手工业作坊”。一个多人参与的场域和过程，大家在这个场域和过程中互相对话沟通，共同思考，调查分析，也就是众人的集体研究。工作坊最可借鉴的是三个依次递进的操作模式：首先是共同分享基本资料。通过这样一个分享，大家有了共同的话题和话语可供讨论，进而凝聚共识；其次是小组提案设计。就是分专题进行讨论，参与者和专业工作者互相交流意见；最后是全体表达意见。就是大家一起讨论即将发表的成果，将个体和小组的意见提交到更大的平台上进行交流。在6月20日的报告中，“学术工作坊”的操作模式得到与会诸位学者的首肯，同时我简单

介绍了为什么是“沁河流域”，为什么是沁河流域中游沁水—阳城段，沁水—阳城段有什么特征等问题，既是一个“抛砖引玉”，又是一个“鸣锣开张”。

在集体走进沁河流域之前，我们特别强调做足案头工作，就是希望大家首先从文献中了解和认识沁河流域，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初步确定选题，以便在下一步的田野工作中尽量做到有的放矢。为此，我们专门请校图书馆的同志将馆藏有关沁河流域的文献集中在一个小区域，意在大家“共同分享基本资料”，诸位开始埋头找文献、读资料，校图书馆和各院系及研究所的资料室里，出现了工作坊同人伏案苦读和沉思的身影。我们还特意邀请对沁河流域素有研究的资深专家、文学院沁水籍教授田同旭作了题为“沁水古村落漫谈”的学术报告；邀请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阳城籍教授张俊峰作了题为“阳城古村落历史文化刍议”的报告。经过这样一个40天左右“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过程，诸位都有了一种“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感觉。

2014年7月29日，正值学校放暑假的时机，也是酷暑已经来临的时节，山西大学“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一行30多人开赴晋城市，下午在参加晋城市主持的简短的学术考察活动启动仪式后，又马不停蹄地赶赴沁水县，开始了为期10余天的集体田野考察活动。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虽是酷暑难耐的伏天，但“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的同人还是带着如火的热情走进了沁河流域。脑子里装满了沁河流域的有关信息，迈着大步行走在风光无限的沁河流域，图书馆文献中的文字被田野考察的实情实景顿时激活，大家普遍感到这次集体田野考察的重要和必要。从沁河流域的“北方城堡”窦庄、郭壁、湘峪、皇城、郭峪、砥洎城，到富有沁河流域区域特色的普通村庄下川、南阳、尉迟、三庄、下孔、洪上、后则腰；从沁水县城、阳城县城、古侯国国都端氏城，到山水秀丽的历山风景区、人才辈出的海会寺、香火缭绕的小尖山、气势壮阔的沁河入黄处；从舜帝庙、成汤庙、关帝庙、真武庙、

河神庙，到土窑洞、石屋、四合院、十三院；从植桑、养蚕、缫丝、抄纸、制铁，到习俗、传说、方言、生态、旅游、壁画、建筑、武备；沁河流域的城镇乡村，桩桩件件，几乎都成为工作坊的同人们入眼入心、切磋讨论的对象。大家忘记了炎热，忘记了疲劳，忘记了口渴，忘记了腿酸，看到的只是沁河流域的历史与现实，想到的只是沁河流域的文献与田野。我真的被大家的工作热情所感染，60多岁的张明远、上官铁梁教授一点不让年轻人，他们一天也没有掉队；沁水县沁河文化研究会的王扎根老先生，不顾年老腿疾，一路为大家讲解，一次也没有落下；女同志们各个被伏天的热火烤脱了一层皮；年轻一点的小伙子们则争着帮同伴拎东西；摄影师麻林森和戴师傅在每次考察结束时总会“姗姗来迟”，因为他们不仅有拍不完的实景，还要拖着重重的器材！多少同人吃上“藿香正气胶囊”也难逃中暑，我也不幸“中招”，最严重的是8月5日晚宿横河镇，次日起床后竟然嗓子痛得说不出话来。

何止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停地奔走，不停地转换驻地，夜间大家仍然在进行着小组讨论和交流，似乎是生怕白天的考察收获被炙热的夏夜掠走。8月6日、7日两个晚上，从7点30分到10点多，我们又集中进行了两次带有田野考察总结性质的学术讨论会。

8月8日，满载着田野考察的收获和喜悦，“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的同人们一起回到山西大学。

10余天的田野考察既是一次集中的亲身体验，又是小组交流和“小组提案设计”的过程。为了及时推进工作进度，在山西大学新学期到来之际，8月24日，我们召开了“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选题讨论会，各位同人从不同角度对各选题进行了讨论交流，深化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细化了具体的研究计划。我在讨论会上还就丛书的成书体例和整体风格谈了自己的想法，诸位心领神会，更加心中有数。

与此同时，相关的学术报告和分散的田野工作仍在持续进行着。为了弥补集体考察时因天气原因未能到达沁河源头的缺憾，长期关注沁河上游

生态环境的上官铁梁教授及其小组专门为大家作了一场题为“沁河源头话沧桑”的学术报告。自8月27日到9月18日，我们又特意邀请三位曾被聘任为山西大学特聘教授的地方专家就沁河流域的历史文化作报告：阳城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家胜讲“沁河流域阳城段的文化密码”；沁水县沁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扎根讲“沁河文化研究会对沁水古村落的调查研究”；晋城市文联副主席谢红俭讲“沁河古堡和沁河文化探讨”。三位地方专家对沁河流域历史文化作了如数家珍般的讲解，他们对生于斯、长于斯、情系于斯的沁河流域的心灵体认，进一步拓宽了各选题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加深了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

这个阶段的田野工作仍然在持续进行着，只不过由集体的考察转换为小组的或个人的考察。上官铁梁先生带领其团队先后七次对沁河流域的生态环境进行了系统考察；美术学院张明远教授带领其小组两赴沁河流域，对十座以上的庙宇壁画进行了细致考察；体育学院李金龙教授两次带领其小组到晋城市体育局、武术协会、老年体协、门球协会等单位和古城堡实地走访；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董江爱教授带领其小组到郭峪和皇城进行深度访谈；文学院卫才华教授三次带领多位学生赶去参加“太行书会”曲艺邀请赛，观看演出，实地采访鼓书艺人；历史文化学院周亚博士两次到晋城市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搜集有关蚕桑业的资料；考古专业的年轻博士刘辉带领学生走进后则腰、东关村、韩洪村等瓷窑遗址；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人类学博士郭永平三次实地考察沁河流域民间信仰；文学院民俗学博士郭俊红三次实地考察成汤信仰；文学院方言研究教授史秀菊第一次带领学生前往沁河流域，即进行了20天的方言调查，第二次干脆将端氏镇76岁的王小能请到山西大学，进行了连续10天的语音词汇核实和民间文化语料的采集；直到2015年的11月份，摄影师麻林森还在沁河流域进行着实地实景的拍摄，如此等等，循环往复，从沁河流域到山西大学，从田野考察到文献理解，工作坊的同人们各自辛勤劳作，乐在其中。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2015年5月初，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同志开始参与“沁河风韵系列丛

书”的有关讨论会，工作坊陆续邀请有关作者报告自己的写作进度，一面进行着有关书稿的学术讨论，一面逐渐完善丛书的结构和体例，完成了工作坊第三阶段“全体表达意见”的规定程序。

“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是一个集多学科专家学者于一体的学术研究团队，也是一个多学科交流融合的学术平台。按照山西大学现有的学院与研究所（中心）计，成员遍布文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育学院、体育学院、美术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城乡发展研究院、体育研究所、方言研究所等十几个单位。按照学科来计，包括文学、史学、政治、管理、教育、体育、美术、生态、旅游、民俗、方言、摄影、考古等十多个学科。有同人如此议论说，这可能是山西大学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真正的一次学科交流与融合，应当在山西大学的校史上写上一笔。以我对山大校史的有限研究而言，这话并未言过其实。值得提到的是，工作坊同人之间的互相交流，不仅使大家取长补短，而且使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平得以提升，他们就“沁河风韵”发表了重要的研究成果，甚至以此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

“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是一次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结合的学术实践，是图书馆和校园里的知识分子走向田野与社会的一次身心体验，也可以说是我们服务社会，服务民众，脚踏实地，乐此不疲的亲尝亲试。粗略统计，自2014年7月29日“集体考察”以来，工作坊集体或分课题组对沁河流域170多个田野点进行了考察，累计有2000余人次参加了田野考察。

沁河流域那特有的风尚和韵致，那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吸引着我们。奔腾向前的社会洪流，如火如荼的现实生活在召唤着我们。中华民族绵长的文化根基并不在我们蜗居的城市，而在那广阔无垠的城镇乡村。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是文化先觉的认识者和实践者，知识的种子和花朵只有回落地才有可能会生根发芽，绚丽多彩。这就是“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同人们的一个共识，也是我们经此实践发出的心灵呼声。

“沁河风韵系列丛书”是集体合作的成果。虽然各书具体署名，“文责自负”，也难说都能达到最初设计的“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写作要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每位作者都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作，每一本书的成稿都得到了诸多方面的帮助：晋城市人民政府、沁水县人民政府、阳城县人民政府给予本次合作高度重视；我们特意聘请的六位地方专家田澍中、谢红俭、王扎根、王家胜、姚剑、乔欣，特别是王扎根和王家胜同志在田野考察和资料搜集方面提供了不厌其烦的帮助；田澍中、谢红俭、王家胜三位专家的三本著述，为本丛书增色不少；难以数计的提供口述、接受采访、填写问卷，甚至嘘寒问暖的沁河流域的单位和普通民众付出的辛劳；田同旭教授的学术指导；张俊峰、吴斗庆同志组织协调的辛勤工作；成书过程中参考引用的各位著述作者的基本工作；山西人民出版社对本丛书出版工作的大力支持，都是我们深以为谢的。

引言

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来华，开启了西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华传教的事业。此后百余年里，数以千计来自西方各国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引领了中西间的文化交流，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建立了教堂，还创办了大量的学校、医院、出版、社会福利等机构，将西方宗教、政治、科技、文化、教育、医学等近代知识引入中国，同时借由书信、报告、日记、回忆录，乃至传记、报刊等著述形式，将其在华的所见所闻介绍给西方的读者，促进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但是，中国民众（甚至学者）较为熟知的绝大部分是男性传教士：例如美国人丁韪良（W. A. P. Martin，1827—1916），在中国生活达62年之久，任京师大学堂及其前身京师同文馆总教习30余年。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长期供职于晚清时期最重要的官方翻译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共译出各类西学著作一百数十种，是清末士人获得近代西学新知的重要来源；1896年起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首任东方学教授，1912年拿出个人积蓄6万两白银在上海设立盲童学校，救助当地的残疾人士。英国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1876—1879年间，华北数省爆发极为严重的旱灾，李提摩太积极募款，先在山东，继而在灾情最为严重的山西进行赈济；19世纪90年代，李提摩太在上海主持清末极负盛名的基督教出版机构——广学会的工作，并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著述，呼吁中国进行变革，对后来的戊戌维新影响甚大；“庚子事变”后，主张以新式的西方教育来弥合中西之间的隔阂，由是创立了百年学府山西大学的前身——山西大学堂。

上述三位皆以在中国长期从事社会文化事业方面的工作而为人所熟知，在信仰的层面影响较大的则是英国人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

1905)。戴德生创立的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是19世纪末中国规模最大的基督教传教团体,也是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差会之一。该会是没有宗派的传教团体,强调信仰的纯正;以向中国内陆省份传扬福音为宗旨,要求传教士离开沿海口岸城市,到那些被遗忘忽略的内地群体中传教;注重适应中国当地的文化和社会习俗,传教士在生活、语言、起居和衣着上尽量中国化;传教工作不倚靠政治势力的庇护,在发生民教冲突如义和团运动后,有人员、财产损失上也多不主张索赔;在经济上完全凭信心,传教士没有固定的薪水;该会最重要的使命是传教,其他以文字、教育、医疗等方式去影响中国,均属次要的部分。^[1]

然而,来华的传教士并非全为男性,里面也包含了不少女性。19世纪西方基督教内出现女性传教运动的著名口号“妇女工作为妇女”(Woman's Work for Woman)。1877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牧师(A. P. Happer, 1818—1894)将其引入中国。(*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1877*)从哈巴安德的报告以及会上的回应来看,基督教界普遍支持女传教士在中国妇女传教活动中的角色。此后,女性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事业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日益加重,其绝对数量以及在所有传教士中的比例都在上升。(见表1)

关于女传教士在教会内部以及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研究已经开始有一些,如英国学者杰弗里·考克斯(Jeffrey Cox)在《1700年以来的英国传教事业》(*The British Missionary Enterprise since 1700*)一书系统研究了女性在近代以来英国全球传教活动中的重要性;美国学者简·亨特在《优雅福音:20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一书中研究了20世纪初来华的美国女传教士。但总体上而言,女传教士还是常被学术界忽略,甚至在教会历史的书写中也籍籍无名。

[1] 中华内地会是近代山西流布最广的基督教团体,而且与传主艾伟德存在一定的关系。

表1 基督教近代来华传教的女传教人员数量及比例

年份	传教人员总数	男传教人员	女性传教人员			女性人员所占比例
			独身	已婚	合计	
1876	817	410	63	344	407	49.8%
1889	1296	589	316	391	707	54.6%
1905	3445	1443	964	1038	2002	58.1%
1917	5338	1818	1818	1819	3637	61.6%
1920	6204	2285	2015	1904	3918	63.2%

注：本表根据1877、1890、1907年三次来华传教士大会记录以及1922年出版的《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附录八的统计资料整理而成。转引自王奇生：《教会大学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总第4期（1996），第138页。

英国女传教士艾伟德（Gladys Aylward，1902—1970）无疑是女传教士中较为幸运的一个，她同特蕾莎修女（Teresa，1910—1997）那样独特的人物一样，具有强烈地服务社会的意识，故而她的经历与模范性的人生常被人讲给新的读者听，而且常被写成新的传记，用于教育孩子们。（David Nash, *Christian Ideals in British Culture: Stories of Belief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algrave Macmillan, 2013）据笔者目力所及，迄今为止，关于艾伟德的传记已不下数十种，而且她在中国传教以及救助难童的经历还被拍成了一部广受欢迎的电影，即1958年由好莱坞著名影星英格丽·褒曼主演的《六福客栈》。

艾伟德在西方世界久已广为人知，但是相关传记多由宗教界人士撰写及使用，更多重视的是其垂范以及教化的功能，对人物史实的部分并不看重。艾伟德为中国尤其是中国内地民众所了解，是近些年才发生的事。相关中文著述主要包括张继新等人翻译的《八福客栈》（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林云编译的《震撼世界的六福客栈：英国小妇人艾伟德与中国阳城》（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以及张石山、谭曙方的《六福客栈：小妇人艾伟德传奇》（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需要指出的是，后两部书的作者均为艾伟德广为人知的事迹发生地——山西省的人士。在他们的创作中，进行了大量实地调查及访谈，对于推广普及人们对艾伟德